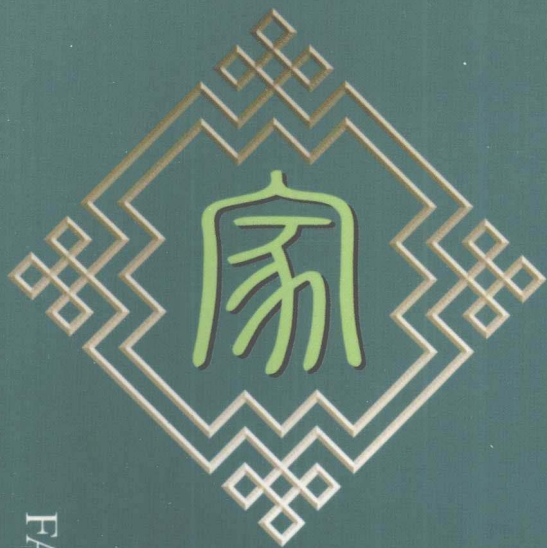


第七卷



FAMILY STUDIES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国家庭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 编

中国家庭研究

第七卷

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家庭研究. 第七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520-0128-0

I. ①中... II. ①上... III. ①家庭问题—中国—文集
IV. ①D66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2677 号

中国家庭研究(第七卷)

编 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沈 洁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2.5

插 页: 2

字 数: 41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128-0/D·239

定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中国家庭研究

1	亚洲现代性中的“亲密和公共领域的重建”：家庭主义及其 超越..... 落合惠美子
20	无个体主义的个体化：东亚社会的压缩现代性和令人困惑的 家庭危机..... 张景燮
33	生命历程研究的新方向 K. U. 梅耶
50	万事俱备，只差金钱 ——经济条件对同居者做出结婚决定的影响 P. J. 斯莫克 W. D. 曼宁 M. 波特
71	性规范的重构：对中日青年婚前性行为的质性比较研究 刘雅格 索格飞 土屋晴香 孙中欣
92	长期伴侣关系是浪漫爱情的坟墓吗？ B. P. 阿塞维多 A. 阿伦
103	“相貌出众，一生乐事”？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身体吸引力 M. M. 耶格
119	婚姻质量与个人幸福感：一个元分析 C. M. 普罗克斯 H. M. 赫尔姆斯 C. 比勒
136	福利国家的性别不平等：家务分工中的性别隔离 (1965~2003) J. L. 胡克
163	充满水杯 ——关于家庭的性别视角 M. M. 费里
177	后父权制时代：性别与代际交叉视角下的个体家庭 沈奕斐
191	亲密伴侣权力及其对性别平等感的影响机制 徐安琪

211	抑郁和夫妻权力：一个公平模型	J. 米洛斯基
237	婚姻、恋爱和其他关系中的性：一项 10 年回顾	F. S. 克里斯托弗 S. 斯普雷彻
258	美国的结婚和同居男女的性不忠	J. 特雷斯 D. 吉森
275	中国城市的父母和已婚子女同住：家庭价值观的结果？	J. R. 罗根 边馥琴
298	个人和家庭变量的信度及其在历时性研究中的稳定性 分析	A. 桑顿 G. 宾斯多克
316	婚姻与儿童福利：研究和政策的视角	S. L. 布朗
335	美国《婚姻与家庭杂志》最新目录	
346	新作索引	

Contents

Reconstruction of Intimate and Public Spheres in Asian Modernity;			
Familism and Beyond	Ochial Emiko	1	
Individualization without Individualism: Compressed Modernity and			
Obfuscated Family Crisis in East Asia	Chang Kyung-Sup	20	
New Direction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Mayer, K. U.	33	
"Everything's There Except Money": How Money Shapes Decisions to			
Marry Among Cohabitors	Smock, P. J. Manning, W. D.		
	Porter, M.	50	
Re-Embedding Sexual Meanings: A Qualitative Comparison of the			
Premarital Sexual Script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Young Adults			
.....	Farrer, J. Suo, G. Tsuchiya, H. Sun Zhongxin	71	
Does a Long-Term Relationship Kill Romantic Love?			
.....	Acevedo, B. P. Aron, A.	92	
"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 Returns to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over the Life Course	Jaeger, M. M.	103	
Marital Quality and Personal Well-Being: A Meta-Analysis			
.....	Proulx, C. M. Helms, H. M. Buehler, C.	119	
Gender Inequality in the Welfare State: Sex Segregation in Housework,			

1965 – 2003	Hook, J. L.	136
Filling the Glass: Gender Perspectives on Families	Ferree, M. M.	163
Post-Patriarchal Era: The Individual Family in the Cross-Perspective of Gender and Inter-Generation	Shen Yifei	177
Intimate Partners' Power and Its Mechanism on the Sense of Gender Equality	Xu Anqi	191
Depression and Marital Power: An Equity Model	Mirowsky, J.	211
Sexuality in Marriage, Dating, and Other Relationships: A Decade Review	Christopher, F. S. Sprecher, S.	237
Sexual Infidelity among Married and Cohabiting Americans	Treas, J. Giesen, D.	258
Family Values and Co-residence with Married Children in Urban China	Logan, J. R. Bian Fuqin	275
The Reliability of Measurement and the Cross-Time Stability of Individual and Family Variables	Thornton, A. Binstock, G.	298
Marriage and Child Well-Being: Research and Policy Perspectives	Brown, S. L.	316
Latest contents of America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335
Appendixes		346

亚洲现代性中的“亲密和公共领域的重建”：家庭主义及其超越

● 落合惠美子

从 1970 年代之后,全世界范围发生了根本性的社会变化。起初,这些社会变化被认为具有“后现代”本质,最后,又被认为是现代性的一个新表现;于是,产生了许多概念来描述这些变化,其中包括乌尔里希·贝克的“第二次现代性”、“反思现代化”、“风险社会”,齐格蒙·鲍曼的“流动现代性”和安东尼·吉登斯的“亲密关系的转型”。用几个词语来概括社会变化的本质并非易事,然而,那些争议性概念都通常强调,在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保持不变的同时,出现了诸多有别于贝克所言的“第一次现代性”(以民族国家和工业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社会特征。正如贝克所描述的,全球化和个体化已经成为社会变迁的特征,这一现象同时存在于宏观层面的变化如全球化,也存在于微观层面的变化(也即与个体生活和家庭有关)。最终,我们面临一个整体的社会变化,可以将其定义为“亲密和公共领域的重建”。

在此,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这种社会变化是否正在世界各地发生——比如,包括当前的亚洲?此前已提及的,与现代性新表现相关的概念,主要是基于 1970 年代以后的西欧经验发展而来的。大多数亚洲社会经历现代化比西欧和北美要晚,因而,即使现在,议题如亚洲公民社会的形成,福利国家的建构,以及其他与第一次现代性有关的议题,在亚洲地区的社会科学领域中仍是重要主题。另一方面,现在许多亚洲社会出现了“最低生育率”,甚至比已处第二次现代性的西欧和北美社会还要低。进而,一些事件变得越来越普遍,如跨国婚姻和雇佣国外家政工,这就意味着全球化的效应已渗透到亚洲生活的最深处。

当代亚洲处于“压缩现代性”阶段(Chang, 1999),其标志就是发展的共时性,即因为现代化过程很短,所以第一次现代性和第二次现代性处于一种“追赶”的状

态。亚洲地区经历了何种社会变化?当亚洲可能发生称之为“亲密和公共领域的重建”时,它以何种方式经历着西欧和北美正发生的变化,又以何种方式经历亚洲特有的变化?社会科学如何将当代亚洲的社会变化理论化?以上作为问题既具体又清晰,其答案却无定论,但是,阐明这些问题,将影响和决定着当代亚洲政策设计的方向,这些问题必须找到答案。

一、理论框架

(一) 第一次现代性的结构

针对“亲密和公共领域的重建”的议题,我们采用第一次现代性和第二次现代性的分析框架,这要从现代社会哲学之父——黑格尔那里开始。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1982)中将“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y)分为三个层次: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家庭由爱情和已婚男女组成,已婚男女放弃了他们的个性,从而合体为一。市民社会由家庭背景下的个人组成,个体都在追寻自身幸福和满足欲望,他人间的关系也由此而生,权利和法律也随之而创,提供制度保障的公共领域,国家也得以创设。这一关于社会的观点——一个人拥有家庭和皆为某国市民——非常典型,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代性。

回顾一下黑格尔哲学的社会历史背景,我们可以说,他所概念化的现代社会结构,乃是形成于他生活的时代。现代民族—国家是被创造而来的,“现代家庭”也一样。“现代家庭”是由研究家庭的社会历史学家如菲利普·阿瑞艾斯(Philippe Ariès)创造出来的;该概念被描绘为亲密、隐私和家庭性(domesticity)。然而,这种家庭观,在对亲属成员范围(包括丈夫、妻子和孩子)的认识上过于狭隘化,它切断了家与更为广泛的亲属和邻居的联系,将家隔绝于一个隐私世界中,从而创造了一种亲密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家庭成员靠很强的情感纽带而紧密相连,丈夫外出打拼和赚钱,而妻子留守家庭,献身于家务和孩子养育。一直到几十年前,这种家庭都被视为标准;然而,关于家庭历史的研究却揭示出,这种家庭类型只不过是脱胎于现代化时代的一个历史建构。

由布鲁纳所描绘的“全体家户 *Das ganze Haus*”(the whole house),被视为对以前家庭定义的范例。按其所言,“家户(house)是一个社会,同时又是一个共同体”(Otto Brunner, 1968=1974, 161-162)。这种说法适用于日本,如当家以生产为基本功能的时代,家是一个工作场所,家庭成员为工作团体,佣人和其他非亲属成员一起劳动,隐私只存在于夫妻共眠的一个小空间中。

公共领域,作为一个与家庭界限分明的领域,还没发展起来。无论是在欧洲中

世纪,还是在日本的现代化初期的世袭国家中,贵族的家户对其臣属来说,都具有公共的意义。女性因其与国王的亲密关系,有时候会比男性政治家拥有更多的权力(Mitsunari, 2005: 46)。公共的一种含义是与性爱及其结果生育相关联的。皇后可能会在她的侍臣面前生育孩子。不仅仅是婚姻,男性同性恋在政治上也作用不小。然而,到了20世纪初,此类事件开始被认为是“丑闻”(Hoshino, 2006);作为结果,公共领域只保留了同性社会关系,形成了一个“无性”的社会领域。

我们需要阐明“道德共同体”三层含义——即家、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概念关系,以及“公共”和“私人”的概念内涵。“公共”概念的使用有两种方式,一种理论只用于国家,另一个也用于市民社会。前者的典型代表是汉娜·阿伦特,她研究古希腊的政策。公法和私法相分野因循的也是此逻辑脉络。相对比之下,尤尔根·哈贝马斯属于后一派思想,他强调公众聚集的团体作用(Habermas, 1962)。非政府组织(NGOs)的角色和志愿主义皆是从这种思想推演出来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定位关于公共领域的相互矛盾的定义?看一下公共领域的反面意思,多为“亲密”、“私人”和“家庭性”,这些被视为现代家庭的特征,但这三个词语的含义有所不同。从定义来看,家庭性与家相关联,但其他两个却无此关联。例如,与公共性很强的国家相比,市场被认为是私人的。爱情和亲密关系有时候存在于家庭之外。仅就现代家庭而言,与公共领域的三个矛盾性概念相对应的各个领域都有所重叠。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也即考虑到时间和变化因素,不同概念间的关系将变得界限不清。

(二) 人口转型与现代性

此处,在分析人口的变化时,我提出一个与第一和第二次现代性有关的分析框架,即使贝克本人对其概念的人口学含义不甚清楚。就其初始意义来讲,人口转型(下面称其为“第一次人口转型”,以与后面提到的“第二次人口转型”相区别)被认为是一种不可逆变迁,即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平衡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平衡转变,后者创造了人口学意义上的现代性。正如工业革命创造了商品生产的现代性,人口转型创造了人口生产的现代性。低生育率,与传统相比,每对配偶都生育更少的孩子,这既是现代家庭以孩子为中心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当父母在每个孩子的养育中,花更多的感情和金钱时,情况尤其如是。因而,生育率下降形成了人口的第一次转型(我们称其为生育率的第一次下降),也被认为是现代家庭的一个标示,成为大多数社会的主要特征(Ochiai, 1997: chapter 5)。在西欧和北美,从1880年代到1930年代,几乎所有地方(除了法国)都出现了生育率的第一次下降(见图1)。正在这一时期,大众社会得以形成。我认为正是在这一时期,第一次现代性的社会结构形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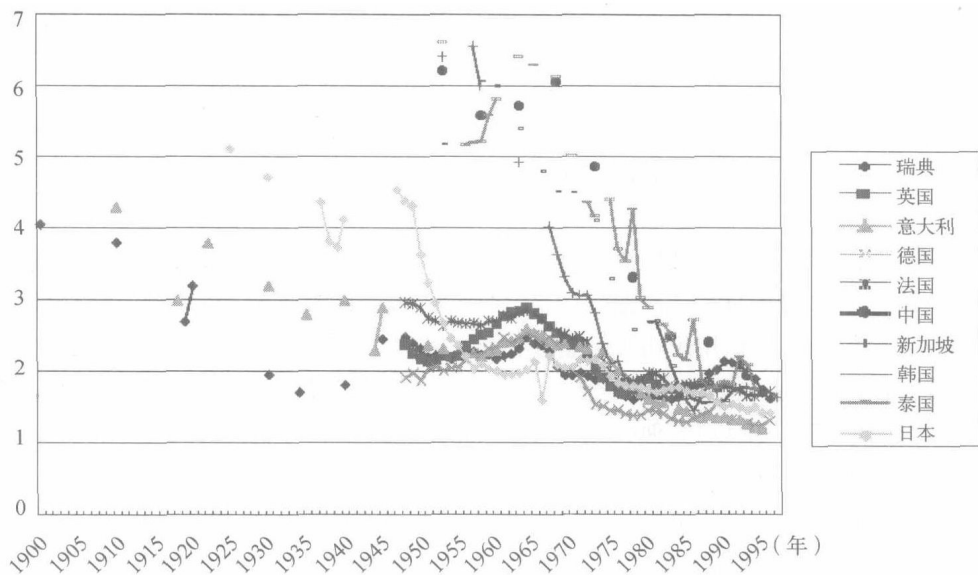


图1 部分国家的总体生育率状况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

死亡率的下降,人口转型的另一特征,对大众的生命历程及其家庭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较低的婴儿死亡率和成人死亡率,生活变得愈加稳定和可预期,一个标准化的生命历程开始出现(Anderson, 1983)。由于公共教育的制度设置和毕业觅职的惯例形成,标准化生命历程愈加稳定。中年死亡几率的降低,导致了婚姻持续时间的延长(Anderson, 1983)。每个人都结婚并与配偶几乎终身相守,只有形成这种人口社会环境,黑格尔的第一次现代性,即每个人都被假定为家庭的一部分,才成为可能。换句话说,第一次人口转型创造了第一次现代性的基础。

继这次人口转型之后,出现了一个稳定期。生育率保持在替代水平上下,几乎所有的男性和女性都结婚并生育2~3个孩子。可是,1960年代末期,西欧的生育率又开始下降;我们称这种现象为第二次生育率下降。那时,生育率跌至次替代水平,与此同时,离婚率开始上升。起初,人们认为这是暂时的越轨,但这一变化持续的时间非常久,以至于人们认为这是不可逆的;开始被判定为是人口的第二次转型(Van de Kaa, 1987; Lesthaeghe, 1991)。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同居而不是依法结婚;更有甚者,据说在欧洲,婚姻作为制度已经解体,已经成为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同居趋多,还有一些人与同性别的人一起过着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2007年,在瑞典、挪威和法国,有超过半数的子女为婚外生育,在德国和意大利,这一比例分别为30%和20%(欧盟统计局)。

随着终身婚姻和作为制度的家庭的衰落,家庭已不再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反而是个体成了基本单位。结果,“亲密”的概念开始取代了“家庭性”,位居其上。“亲密”被定义为一种“个人间的特殊关系”(吉登斯,1992=1995: 95);它发生于家庭之中,也存在于家庭之外。吉登斯称之为“亲密关系的转型”,个体不断地追求“纯粹”关系;当要求与他人关系更紧密时,这种关系却难以持久。人们不能脱离亲密关系,但当他们追寻纯粹关系时,却愈加地个体化。第二次现代性的特征——如“个体化”和“亲密关系转型”——事实上也是第二次人口转型的特征。

(三) 性别和现代性

作为现代性转型的一个指标,我们需要探讨一下社会性别。黑格尔认为,男女通过婚姻形成一个单独个体,但那种社会性别中有从属角色。男主外而积极,女主内而消极。的确,家庭任务是养育孩子,将其培养为独立个体而送入市民社会,但这种观念的出发点,却是男孩是将来的一家之主,而女孩将成为妻子(黑格尔,1821=2001)。因而,夫妻合二为一的个体实际上只是丈夫的个体,只有丈夫才会进入社会,家庭被滞留其身后。

从社会现实来看,这意味着什么?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西欧和北美,经历了现代家庭时期和女性就业率的下降,后者涉及女性的“主妇化”问题。印度经济学家 J. N. 辛哈(J. N. Sinha, 1965)通过分析联合国数据,提出了一个经济发展和已婚女性就业关系的“U”形假设。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农业规模的缩小和传统工业的衰落,降低了女性就业的机会,而且,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女性外出就业的需要不断降低。为了再促进女性外出就业,现代工业必须先行一步发展,从而扩大劳动力需求。这个“U”形也被其他研究证实(Osawa, 1993)。就与社会性别的关系来说,第一次现代性是以性别的劳动分工为特征的,也即男人是养家糊口者,而女性则献身于家务和孩子养育。

然而,自从1970年代第二次现代性开始,西欧和北美的女性就业率开始上升,恰是上面提及“U”形的右半边,这也被称之为“去主妇化”现象(Ochiai, 2008a, 4-5),是“主妇化”的反向运动。起初,存在一些地区差异,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相比,德国的上升较慢;目前,除了南欧以外,西欧和北美所有地区的女性,都和男性一样,是持续就业。

在西欧和北美,在性别劳动分工衰弱的背后,是1973年能源危机(也称为“石油震荡”)后的长期经济衰退。在欧洲,就业受工会保护,年轻人失业严重,很少有年轻男性能从经济上供养主妇,由于就业对男女来说,都是不稳定的,那些有工作的人不得不工作,还没有性别分工的“奢侈”空间。当然,1960年代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造成的价值观变迁,为国际组织所认可,有效地促进了性别平等成为普适性

的价值观,但削弱性别劳动分工的主要原因,依然是当时的经济需求。

人口背景也削弱了性别劳动分工。在欧洲和北美,人口变化起步早,人口老龄化也来得早。自从 1970 年代,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10%,到了 1980 年代,这一比例为 15%。对劳动适龄女性的就业动员,被视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必要对策。

(四) 第二次现代性的结构转型

从人口学来看,第二次现代性的特征为第二次人口转型,它削弱了以性别为基础的劳动分工,或者说妇女的去主妇化。在黑格尔时代,如果我们聚焦于微观层面的环境,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中,但第二次现代性标志着黑格尔时代的终结,这可以被称为“个体化”,随之出现“亲密关系的转型”和性别平等的发展。这些变化的发生,不但伴随着人口和经济变化,而且获得大量的制度支持。

现代家庭的法律有一个特点,即法律效应的差异通常取决于它适用于家庭的“内”还是“外”,这可以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即“法不进家门”。那些通常被处理为身体伤害和偷盗的案件,如果发生在家里,就根本不会被当回事。提到这点,预防家庭暴力的法律——近些年很多国家都已经立法——倒是“法进家门”的新案例。

在西欧和北美,法律和体制建立的社会单位是个体而不是家庭;这种法律和制度的思想出发点,认为个体不应该因其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同而被区别对待,包括是否组建家庭的选择。我们可以说,家庭不再是阻碍公共领域介入的墙,因而个体可以直接面对公共领域,这是市民社会在微观领域的扩展。同时,性别平等成为了可以超越国家边界的价值,至少在欧洲和北美,那些曾阻碍性别平等的制度和习俗,正在遭到摒弃。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看一下宏观层面,一系列事件如苏联解体、美国全球权力的集中化和全球市场的发展,在支持某些超越国际边界的共同体的建立。我们也许可以将之称为宏观市民社会的扩展。或许,我们认为这一变化正朝向贝克所言“全世界的现代性”,与之相伴的还有全球平等的人权观。

在此意义上,第二次现代性带来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与哈贝马斯当初设想的不同。我们见证了市民社会在宏观和微观方向的扩展,在宏观层面跨越了国家边界,在微观层面穿透了家庭之墙。第二次现代性正在探索新的路径和新的社会秩序,同时带来亲密和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变化。

二、亚洲现代性的逻辑

(一) 人口转型和亚洲的现代性

此前,为了说明处于第一次现代性和第二次现代性时期现代社会的结构变化,我们论证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然而,这个理论分析主要基于西欧和北美的历史经

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亚洲,我们该如何将当前正发生的变化理论化?

首先,我们应评估一下发生在亚洲不同社会中的人口变化情况。图 1 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总合生育率(TFR)情况,也包括欧洲部分国家和美国。首要需关注的是,除了少数例外,一个地区的不同国家——如欧洲或亚洲——几乎是同时经历生育率下降的。我们可以观察生育率停止下降的点,或者说是下降到替代水平作为结束第一次生育率下降的点。欧洲和亚洲——除了法国和日本——两个地区发生生育率下降的时期大约相差了 50 年。众所周知,生育率下降始于大革命后的法国。日本第一次生育率下降发生于 1950 年代,在时间上,恰好处于大多数欧洲国家和大多数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

那么,日本又是何时发生第二次生育率下降呢?前面已提及,欧洲和美国发生于 1960 年代末。然而,在这些地区内部,各个地域也存在略微的时间差异。北欧首先开始生育率的下降,然后是西欧,接着是开始于 1970 年代中期的南欧。日本也是从 1970 年代中期开始经历生育率的下降。就第一次生育率下降来看,日本和大多数的欧洲国家有约 25 年的时间差;然而,第二次生育率的下降却仅差寥寥数年。后发国家的现代性因此是被“压缩”了的(Chang, 1999)。

那么,除了日本,亚洲其他各国是否发生了第二次生育率下降呢?带着这样的问题,再看图 1,让人迷惑。亚洲各国的生育率下降是连续性的;无法像欧洲、美国和日本那样,在第一次生育率下降和第二次生育率下降之间划分界限。如果我们操作性地把生育率下降至替代水平以下视为第二次生育率下降的话,那么,新加坡的第二次生育率下降开始于 1970 年代的中期,仅仅落后日本数年。同时,韩国、泰国和中国,则分别开始于 1980 年代初期、1980 年代后半期和 1990 年代。

如果我们将这两次生育率下降的中间间隔期——当生育率稳定且保持在替代水平——认为是第一次现代性的“黄金年代”,这个时间长度在欧美地区为 50 年,日本为 20 年,而亚洲其他国家则几乎为零。除日本之外,亚洲国家并没有经历一个第一次现代性的稳定期,而是急速地直接进入了第二次现代性。目前,亚洲不少地区的生育率非常低,甚至比大多数欧洲国家还要低,例如,中国香港的总合生育率为 1.12(2006)、韩国为 1.14(2005)、新加坡为 1.32(2005)、日本为 1.34(2007),这些都是生育率最低的社会。

前面曾提到,第一次人口转型对婚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人死亡率的下降带来了婚姻的稳定性。然而,传统婚姻文化的影响因社会不同而大有不同,因此,包括在我们研究的亚洲,我们在讨论人口转型之前必须先讨论文化差异。基督教国家禁止离婚,日本则无此禁令,因而曾出现大量的离婚和再婚。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日本东北地区的离婚率和当今的美国一样高(Ochiai, 2000: 72 - 75)。1868

年明治维新到 1940 年代,离婚率开始回落,具体见图 2;伴随着成人死亡率的下降,日本的婚姻稳定性大为提高。欧洲的婚姻稳定性也在提高,但没有日本的那么明显,具体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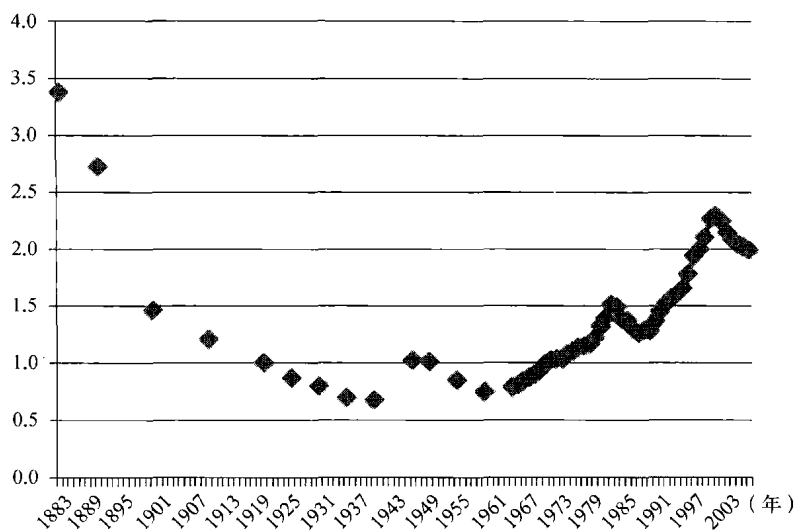


图 2 1883~2008 年日本的离婚率情况

资料来源:《2008 年日本的人口统计》,国家人口和社会安全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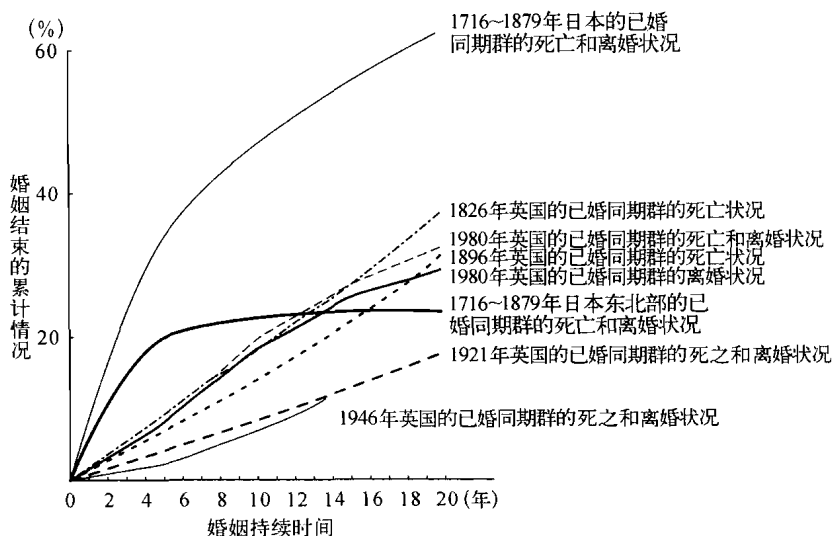


图 3 英国和日本的婚姻结束情况

资料来源:英国数据来自安德森(Anderson, 1983),日本数据来自落合惠美子(Ochiai, 1997)。

至于亚洲的婚姻传统,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类型。一方面,像韩国和中国,存在抵制离婚和再婚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存在视离婚、再婚和婚前性行为平常的东南亚国家(Raid, 1993, Tsubouchi & Tsubouchi, 1970)。从婚姻角度来看,日本前现代的生命历程,与其说像东亚,不如说更像东南亚国家。亚洲国家比欧洲国家的文化更多样,因而,不能假定亚洲的现代化发展方向都是一样的。

第二次人口转型对婚姻的影响,还是研究探索的主题。与人口生育率的变化相比,亚洲社会的婚姻变化展现得较慢。然而,亚洲社会出现了离婚率上升,初婚年龄提高和不婚比例的增多。一些研究认为亚洲在步欧洲的后尘,同样经历着第二次人口转型;然而,另一些研究却因亚洲的同居人群和婚外生育的稀少,从而持不同看法。最新的研究已证实,至少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同居比例在增多(Lesthaeghe, 2010),但婚外生育却缺乏证据。我们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何会这样?尤其在我们知道亚洲不同地区的婚姻文化传统大不相同之后,我们必须质疑:尽管文化背景不同,为何却一致地抵制婚外生育?

(二) 性别和亚洲现代性

如同现代性的建构路径有所差异,亚洲在社会性别方面的传统和文化更具多样性。在传统时代,与世界水平相比,日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是很高的。1880年代,在明治维新后不久,20~40岁女性的劳动参与保持在70%左右,而且不会因结婚和生育的影响而有所降低,形成了一个图4中“平板形”(table-shaped)的就业模式,这一模式也见于当代欧洲和北美国家。齐藤修(Saito, 1991)认为主干家庭——两代夫妻共居——使两代人共担家务活儿和农活儿成为可能;这也提高了年轻妇女的劳动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在那个水平之上开始降低,战后出现了“M形”的劳动模式。在日本女性中,形成了一个明显的“主妇化”趋势。

当视野扩展到亚洲其他国家,传统类型和现代性路径的多样性又一次让人吃惊。泰国较为稳定,其女性劳动参与的“平板形”模式从1960年代保持至今。其实,这种情况不限于泰国,在东南亚,女性在劳动中扮演积极角色,在财产占有上有重要地位是一个古老的传统,这曾被航海探索时代的欧洲探索者提及过(Reid, 1993)。在南亚的水稻种植地区,女性是重要的劳动者(Sechiyama, 1996),日本也属于这种类型的社会。东南亚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保持着这种模式,城市地区的女性会在小生意或工厂中继续工作,或是在现代办公室中工作。

中国实行重视生产的社会主义政策,因此推进了女性的就业动员;因此,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就业动员而不是主妇化。新加坡——不是社会主义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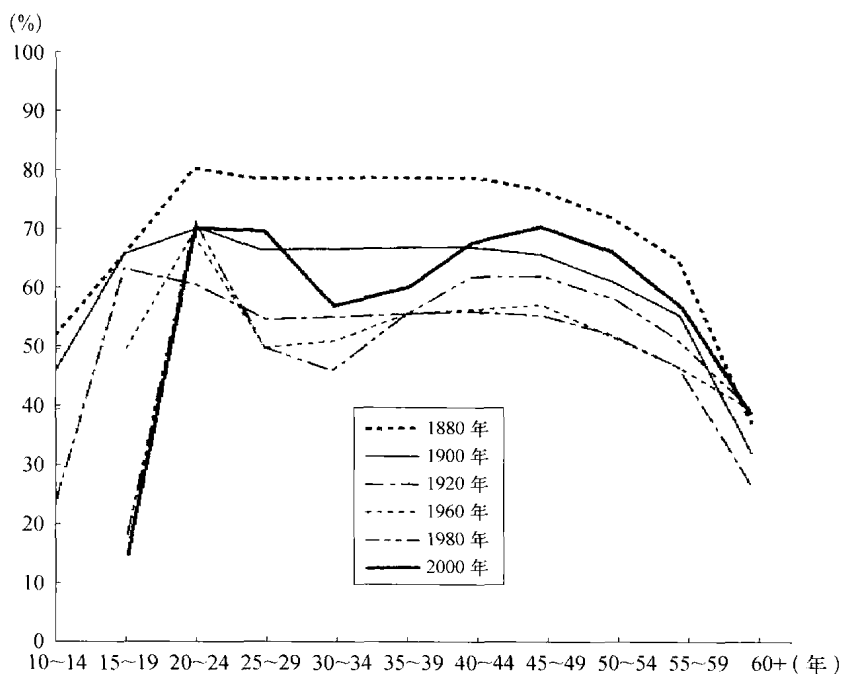


图4 1880~2000年日本不同年龄段女性的就业情况

注：1980年、1990年和1920年的数据来自阿姆米拉的估算。

资料来源：阿姆米拉等(Umemura et. al., 1988)和NIPSSR(2000)。

家——也推动了女性的就业动员,这归因于政府的强势领导,以及据此国家实行的优先发展经济的发展主义战略。中国台湾地区也显示出女性就业率的上涨。

1960年代后的韩国,出现了和日本类似的“M形”女性就业模式。但有一点不能确定,即此前韩国是否有和日本相似的女性就业率下降的经历。由于儒教的影响,韩国的女性就业不可能像日本和泰国那么高。亚洲的现代化对性别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这点难以概说;毕竟,它导致了多种结果,如日本的主妇化,中国和新加坡的去主妇化,泰国(可能也包括韩国)的无变化。

然而,近些年,新加坡、泰国和中国出现了一些变化。在这些国家,女性一般在生育后保持连续就业,然而,不论是否出于失业、儿童照顾机构的缺少,还是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的原因,不少女性自愿或非自愿地成为家庭主妇(Ochiai, 2008b)。如果我们看一下女性是否赞同性别劳动分工——男人在外打拼而女人留守家庭——观念的调查结果的话,亚洲国家显示出与西方国家取向的明显不同(图5)。西方世界,性别分工已过时,但在亚洲却有一个的“有趣”趋势:即越是就业高的地方,反而越支持性别分工(图5中的中国和泰国数据)。看起来好像正在出现一种大众